

出版说明

由于时代的某种制约和局限，路翎，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经过时间的剥蚀，时代的某些制约和局限已渐渐淡化，作品自身的价值便越来越显露出来了。今天，许多读者重新打开路翎的作品时，都情不自禁地会对作者卓越的创作才华发出深深的惊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很少有像路翎这样的作家，能以如此强烈的激情，去与那严峻的生活搏斗，去同自己激烈的内心世界搏斗，从而创造出了一个丰富复杂、震撼心灵的艺术典型。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能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涌现出更多的饱蘸着作者自己生命激情的艺术形象，以激励人们在生活中奋斗的热情，我社特编辑出版了这套《路翎文集》。

文集共分四卷，收录了路翎的主要作品。第一、二卷收录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宏伟的史诗《财主底儿女们》；第三卷收录了路翎的较有影响的中长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燃烧的荒地》和剧本《云雀》；第四卷收录了作者16篇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最后还附录了几篇评价路翎及其作品的文章。

文集的出版得到了路翎的夫人余明英同志的大力支持，绿原同志为文集专门写了序，在此我们深表谢忱。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文集在编辑过程中的不足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及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年2月1日

《路翎文集》序

绿 原

路翎带着难以愈合的创伤和我们永别，已经一周年了。安徽文艺出版社将出版他的文集四卷，他的读者会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这部文集虽说没有包括他的全部作品，但已是它的主要部分，而且都是从1940年起短短十五年创作生涯的硕果。单看头两卷所收的一个长篇，就其规模宏大、内容深广而论，也不妨重复一下胡风先生的一句预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在《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路翎》卷^①的序文中，我曾经说过，路翎由于坚持“用心写作”的创作方法，得罪了“用脑对待文学现象”的批评家，以致得到文学史上最悲惨的遭遇。然而，这场遭遇丝毫没有抵销、反而提高了那句预言的效验性。所谓“用心”、“用脑”云云，不过是一种不确切的形象语言，历史的本来面貌不是那么简单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芸芸众生挣扎图存于抗战炼狱中的四十年代，青年作家路翎凭借自己超凡的感受力、思想力和热情，试图搅扰古老民族貌似沉睡、实际上躁动不安的灰色灵魂，努力和他的人物们一起向时代精神的顶点攀登，一路上高举着自己挖出来的但珂式的心呼号前进。他没有从文学教科书学过什么固定的形式，也没有从社会学理论学过什么抽象的命题，更没有按照小市民的趣味虚构热闹而香艳的故事，而是沿着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文学传统，借鉴世界古典文学的创作经验，在广袤如“泥海”、错综如

^①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路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1994年10月香港初版。

“铁蒺藜”的现实生活中，通过体验、思维和创作的综合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地拓展着新文学主题未曾开辟的疆域，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的贫薄的库藏。

以本集所包括的作品为例，长篇《财主底儿女们》不但浓墨重彩地呈现了一个现代封建大家族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必然灭亡的命运，作者更通过对主人公蒋纯祖的叛逆性格的深层次描写，包括这个性格一方面同从四周扑来的封建主义势力的搏斗，另一方面同其“身内残留的个人主义成分及其身外伪装的个人主义压力”^①的搏斗，进行了“一场沉重的战争，意识形态的和文学形象的战争”^②，并为当时清醒而苦闷的青年知识分子唱了一阕痛苦而又欢乐的人生战歌。在中篇《饥饿的郭素娥》中，潜藏在劳动人民身上一直没有获得文学表现的辉煌人性第一次被充分地发挥出来，让一些衰弱而迟钝的心灵们久久为之震颤。短篇《卸煤台下》描写了矿工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相互扶持、共同反抗工头的庄严斗争，以及体现在这场斗争中的集体意识和团结感的觉醒过程；而鞭笞奴才性格、揭露“精神腐蚀”的短篇《罗大斗的一生》，则从另一个角度凸现了当代民主要求的复杂性和迫切性。至于另一些短篇，即使短得像《滩上》、《草鞋》、《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等，读者从一些细小而精悍的情节中，同样感受到主人公誓死反抗压迫势力和压迫环境的斗争意志，感受到作者一贯把人物、读者和他自己紧紧连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以及为这股力量所穿透的独特风格。这一切都有白纸黑字为证，都已经受过并将继续经受各种严峻的考验。

时间已经证明，路翎和他的作品是经得起考验的。提到路翎所经受过的考验，不能不同时提到他的批评家们。真正的批评家当然有义务帮助作家把作品写得更好，但没有权力指挥作家如何

① 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

② 路翎：《我与胡风》，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写作；他的主要任务在于独立地阐释作品，用理论的语言透视作品，使它通过他获得作家本人几乎未曾理解的更深刻的意义。批评家和作家实际上是按照不同的方式探索同一对象，归根到底是分别通过同一作品，从两种反映渠道启发读者认识生活，热爱生活，勇敢地改造生活。二者是“斯文同骨肉”的同志关系，路翎和他的患难与共的挚友、诗人兼批评家胡风先生之间曾经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然而，当年在封闭而浮薄的中国社会里，文学批评却一度朝着相反的方向发挥过专制的作用。迄今令人觉得理之所无而事乃竟有的是，青年作家路翎为在封建压迫下探索个性价值和主观战斗精神的庄严升华，而为中国新文学所作出的如此珍贵的贡献，在一些“用脑对待文学现象”（姑且再用一次这个不确切的定语）的批评家的眼中，不但丝毫没有激起他们作为“作家的知己”所应有的欣悦心情，反而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异端。说得客气一点，他们看惯了用情节演绎结论的创作公式，看惯了高高在上对待人物命运的冷冰冰的客观描摹，只会要求作家按照他们所理解、所设想、所规定的一切进行创作。于是在路翎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物群像面前不禁惶惶然，先是嗡嗡营营，喊喊喳喳，责备这位作者“歌颂自发性”、“迷恋人民的原始强力”、“欣赏精神奴役的创伤”，责备他“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情代替、歪曲纯朴而蠢笨的劳动人民心理”等等；继而一当那些机械的观点在深思的读者面前暴露了它们的庸俗和荒谬，便拿齷齪、蛮横、暴戾的文字垃圾向坚忍不拔的作者大加挞伐（详见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1955年），直至最后动用军警，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些一度独操文柄的批评家根本上由于无知，无知于生活，无知于历史，更不知文艺创作为何物，同时又由于从职业名义而产生的狭隘心理和自大狂，以及进而产生的宗派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了非文学的目的主宰着中国文坛。他们和作家的关系始终是他们自己认为决不可以改变的敌我关系，路翎就是这

种敌我关系下面最初一个牺牲者。这一切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可能由于“领导社会主义文学没有经验”而带有“难免”的性质，但从中国新文学就此出现的几十年停滞以至倒退的衰飒局面来看，那些自封的“社会主义卫士们”又是如何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宝贵信誉啊。

在冷漠而纷扰的荆棘人寰，路翎虽然从没享受过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像一粒顽强的种子，即使落进贫瘠的岩缝里，也能长出特异的花果来。短短十五年创作青春的丰硕成果有目共睹，到1980年被迫搁笔二十五年才被“平反”以后，在逝世前与精神分裂症暗中搏斗的十年间，他也一直没有放下他的“金不换”，仍写出了一些令人欣慰的诗歌、散文、短长篇，共约一百余万字。他的亲人、朋友和读者们默默期待他能战胜沉疴，恢复固有的精力和才思，继续实现他所预定而未竟的文学事业。然而，那只是一厢情愿的祷祝，路翎终于带着难以愈合的创伤永别了我们，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好在历史不是单纯的弯路，它的每一步颠簸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人们将会看到，路翎在他的作品中所追求的一切，会在后代读者中间重新获得热烈的响应，而他从1955年到1994年所走过的漫长的苦难历程，更足以帮助后人认识许多否则认识不清的历史规律，例如每忆及当年那些“批评家”们煮鹤焚琴的盛况，总不免感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必然性，不过是那些规律的小焉者了。路翎毕竟完成了历史托付给他的任务，并且得到了贝多芬所说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倒是他自己说过，“一切生命和艺术，都是达到未来的桥梁”。那么，他的忍耐劳苦如约伯的一生及其辉煌的成就正是一座桥梁，后人将从它上面向更清醒更有韧性更富于希望的未来迈进。

1995年元月，甲戌岁末，北京八里庄

内 容 提 要

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宏伟的史诗式的作品。作者以一·二八至苏德战争爆发这段时间的大后方的生活为背景，以封建大家庭蒋捷三家的一群儿女为主要描写对象，深刻地展现了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搏斗与沉沦。特别是在第二部，作者将聚光灯集中投射在不屈而又矛盾的蒋纯祖的身上，通过主人公那凄厉而又激荡的生命呼喊，将人生的庄严，完整地交给了读者。

这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当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与精神史。并且，作者在创作时，又是把自己整个青春的激情，他精神上的矛盾、痛苦与挣扎，无保留地溶于自己的笔下，因而他所塑造出来的人物的饱满、丰富与复杂，在同时代的作家中，还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这些，也许便是这部作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未被人们深深理解的重要原因。但是，胡风先生当时就断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时间确实证明了胡风的这个断言是有远见的。

序

胡 风

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在这部不但是自战争以来，而且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里面，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真实性愈高的精神状态（即使是，或者说尤其是向着未来的精神状态），它底产生和成长就愈是和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人生纠结得深，不能不达到所谓“牵起葫芦根也动”的结果，那么，整个现在中国历史能够颤动在这部史诗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就并不是不能理解的了。

在封建主义里面生活了几千年，在殖民地意识里面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民，那精神上的积压是沉重得可怕的，但无论沉重得怎样可怕，还是一天一天觉醒了起来，一天一天挺立了起来；经过了无数的考验以后，终于能够悲壮地负起了这个解放自己的战争底重担。人能够概括地对这提出简单的科学的说明，人更应该理解这里的浩瀚无际的、生命跃动的人生实相。在那中间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最敏感的触须，最易燃的火种，另一方面也是各种精神力量最集中的战场，因而也就是最富于变化的、复

杂万端的机体。这种夹在锤和砧之间的存在，人能够简单地对它提出科学的分析和批判，但那里面的层出不穷的变幻，如火如荼的冲激，鲜血淋漓的斗争，在走向未来的历史路程上，却有着多么大的教育的意义。

在这里，作者和他底人物们一道置身在民族解放战争底伟大的风暴里面，面对着这悲痛的然而伟大的现实，用着惊人的力量执行了全面的追求也就是全面的批判。说全面的，当然不应是现象底巨大俱收的罗列，而是把握住精神现象底若干主要的倾向，横可以通向全体，直可以由过去通向未来的倾向。我们看到了封建主义底悲惨败战，凶恶的反扑，温柔的叹息，以及在伪装下面再生了的丑恶的形状，我们看到了殖民地性个人主义底各种形式，一直到被动物性主宰着的最原始的形式，一直到被教条主义武装着的最现代的形式。在这中间挣扎着忠实而勇敢的年青的生灵（们），虽然带着错误甚至罪恶，但却是凶猛地向着过去搏斗，悲壮地向未来突进。这一切，被自一·二八到苏德战争底爆发这个伟大的时代所照耀，被庄严而又痛苦的民族大战争所激荡，被时代要求和战争要求鞭打着的这古国底各种生活触手所纠缠。

人没有权利怀疑作者为什么把舞台限在后方，为什么不正面地接触到劳苦人民底世界，因为这不是作者要在这里负起的任务，人却应该感受得到，在这部史诗里面所照耀的，正是劳苦人民底神圣的解放愿望和他们底伟大的战斗目标。人更应感受得到，作者底一切努力一切争斗，正是为了和读者们一道通向那个愿望，突向那个目标。

作者自己说，一切生命和艺术，都是达到未来的桥梁。正是这个把自己变成达到未来的桥梁或踏脚石的志愿，才有可能产生了把七十个左右的人物底运命旋转在那个愿望那个目标下面的磅礴的气魄。从这里就可以理解作者所说的，他所追求的，“是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的欢乐”。

是的，是“欢乐”。但可以把这换写为“痛苦”，也可以把这换写为“追求”。欢乐，痛苦，追求，这些原是“我们时代的热情”（借用那个蒋纯祖底用语）还没有找出适当的表现语的那个 passion 所必有的含义。时代底 passion 产生了作者底 passion 和他底人物们底 passion。作者说，作为他底对象们底综合性的人物，那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底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然而，人不难感到，作者自己更是举起了他底整个的生命向他底人物们和读者们在呼唤着的。

原来，作者底对于生活的锐敏、感受力正是被燃烧似的热情所推进，所培养，所升华的。没有前者，人就只会飘浮，但没有后者，人也只会匍伏而已罢。没有前者，人当然不能突入生活，但没有后者，人即使能多少突入生活，但突入之后就会可怜相地被那裂缝夹住“唯物的”脑袋，两手无力地抓扑，更不用说能否获得一种主动的冲激的精神了。

不过，这些当是易于被人感受的，除非他是一段木头，但人也许不易感受到贯串在这里面的神经系统似的要素，作者底深邃的思想力量或者说坚强的思想要求罢。没有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热情，现实主义就没有了起点，无从发生，但没有热情和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现实主义也就无从形成，成长，强固的。前者使教条主义狼狈地溃退，后者使客观主义不能够藏身。但若就一部作品底创造过程说，这三者总是凝成了浑然一体的、向人生搏斗的精神力，而这里面的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的成份，开始是尽着引导的作用，中间是尽着生发、坚持的作用，同时也受着被丰富被纠正的作用，最后就收获了新的思想内容底果实。人会吃惊于这部史诗里面的那些痛苦的境界，阴暗的境界，欢乐的境界，庄严的境界……，然而，如果没有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热情，这些固然无法产生，但如果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热情不是被一种深邃的思想力量或坚强的思想要求所武装，作者又怎样能够把这些创

造完成？又怎样能够在创造过程中间承受得起？正是和这种被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所武装的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热情一同存在的，被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热情所拥抱所培养的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使作者从生活实际里面引出了人生底悲、喜、追求、搏斗和梦想，引出了而且创造了人生底诗。

正由于抱着了这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所以作者能够创造出“光明、斗争的交响”。说交响，当然是在众声底和鸣中间始终有着一条主音在。人不难看到，被民族解放战争中间的时代要求和人民要求所照耀，被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意识形态的痛烈的批判所伴奏，回旋着前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底由反叛到败北，由败北到复古主义的历程，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底在个人主义的重负和个性解放底强烈的渴望这中间的悲壮的搏战。

在那个蒋少祖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控诉：知识分子底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义所战败而走到复古主义的泥坑里去。这是对于近几十年的这种性格底各种类型的一个总的沉痛的凭吊。而在那个蒋纯祖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号召：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真正的个性解放，不但要和封建主义做残酷的搏战，而且要和身内的残留的个人主义的成份以及身外的伪装的个人主义的压力做残酷的搏战。这是这一代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接受但却大都不愿诚实地接受，企图用自欺欺人的抄小路的办法回避掉的命运。不用说，和一切真实的心灵一样，作者是向着未来，为了未来的，所以他底热情的形象到了以蒋纯祖底传记为主音的第二部，就更凄厉，更激荡，更痛苦，也更欢乐而庄严。

在被丢掉了的初稿里面，相当于蒋纯祖的那个人物，是走上了比他更年青、更单纯、也就能够直线突进的，在这里的少年陆明栋所走的路，但这里的蒋纯祖却留在了后方，承受了痛苦的搏斗，而且终于倒下了。这是，人物性格底内在要求不能不这样，作

者自己的思想要求也不能不这样。走向未来，当然有种种的路，那里面也当然有直线突进的路，但直线突进的路并不能变为对于此时此地的负担的逃避，而蒋纯祖底性格更不是这样的幸运儿。他得承受更大更大的痛苦的搏斗，从他底搏斗里面展示出更深更广的历史的意义。一个蒋纯祖底倒毙启示了锻炼了无数的蒋纯祖。就这样，作者完成了他底史诗底构成和他底人物底经历。

在我们底文艺领野，矗立着鲁迅的大旗。在今天，人会承认这面大旗，人更乐于自命是这面大旗底卫士，但人却不愿或不肯看见，多年以来（包括鲁迅在生的时候），虽然也有一些来自这个传统的真诚的战斗，但却有多少腐蚀这面大旗，淹没这面大旗的乌烟瘴气。什么是鲁迅精神？岂不就是生根在人民底要求里面，一下鞭子一个抽痛的对于过去的袭击，一个步子一印血痕的向着未来的突进？在这个意义上，不管由于时代不同的创作方法底怎样不同，为了坚持并且发展鲁迅底传统，路翎是付出了他底努力的。

自新文艺诞生以来，一直肯定着学习世界文学底战斗经验。然而，虽然不能抹杀那努力下来的痕迹，但可悲的倒是太容易发现结构底模仿，主题底窃取，人物底抄袭……。世界文学底战斗经验应该指的是，那些文艺巨人们虽然各在时代底限制和思想底限制下面，但却能用着最高的真诚向现实人生突进，把人生世界里的真实提高成艺术世界里的真实的，那一种战斗的路径和战斗的能力。那么，由于人类解放思想底武装和我们伟大的时代底要求这些有利的条件而摆脱了他们底思想上的限制或苦恼，从战斗底需要出发，汲取甚至征服着几个伟大的作家（特别是L·托尔斯泰）底现实主义，路翎也是付出了他底努力的。

但作者是二十几岁的青年，而且成长在生活在激荡一切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所以他底搏斗，人生上的和艺术上的搏斗都燃烧在青春底熊熊的热情火焰里面。人如果能够看出这灼人的青春底火焰的对于我们底人生、我们底文艺有着怎样的寄与，人

就能够把作者自己所说的“失败”和“弱点”只当作青春的热情所应有的特点来理解的罢。

所以，《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首青春底诗，在这首诗里面，激荡着时代底欢乐和痛苦，人民底潜力和追求，青年作家自己的痛哭和高歌！

就暂用这几节话当作对于这首诗和他底读者们的祝福罢。

一九四五，七月三日，记于渝郊避法村

目 录

第一章 题 记.....	(1)
第二章	(58)
第三章	(80)
第四章	(120)
第五章	(154)
第六章	(182)
第七章	(224)
第八章	(258)
第九章	(306)
第十章	(339)
第十一章	(371)
第十二章	(389)
第十三章	(410)
第十四章	(432)
第十五章	(451)

出版说明

由于时代的某种制约和局限，路翎，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经过时间的剥蚀，时代的某些制约和局限已渐渐淡化，作品自身的价值便越来越显露出来了。今天，许多读者重新打开路翎的作品时，都情不自禁地会对作者卓越的创作才华发出深深的惊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很少有像路翎这样的作家，能以如此强烈的激情，去与那严峻的生活搏斗，去同自己激烈的内心世界搏斗，从而创造出了一个丰富复杂、震撼心灵的艺术典型。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能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涌现出更多的饱蘸着作者自己生命激情的艺术形象，以激励人们在生活中奋斗的热情，我社特编辑出版了这套《路翎文集》。

文集共分四卷，收录了路翎的主要作品。第一、二卷收录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宏伟的史诗《财主底儿女们》；第三卷收录了路翎的较有影响的中长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燃烧的荒地》和剧本《云雀》；第四卷收录了作者16篇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最后还附录了几篇评价路翎及其作品的文章。

文集的出版得到了路翎的夫人余明英同志的大力支持，绿原同志为文集专门写了序，在此我们深表谢忱。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文集在编辑过程中的不足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及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年2月1日

《路翎文集》序

绿 原

路翎带着难以愈合的创伤和我们永别，已经一周年了。安徽文艺出版社将出版他的文集四卷，他的读者会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这部文集虽说没有包括他的全部作品，但已是它的主要部分，而且都是从1940年起短短十五年创作生涯的硕果。单看头两卷所收的一个长篇，就其规模宏大、内容深广而论，也不妨重复一下胡风先生的一句预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在《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路翎》卷^①的序文中，我曾经说过，路翎由于坚持“用心写作”的创作方法，得罪了“用脑对待文学现象”的批评家，以致得到文学史上最悲惨的遭遇。然而，这场遭遇丝毫没有抵销、反而提高了那句预言的效验性。所谓“用心”、“用脑”云云，不过是一种不确切的形象语言，历史的本来面貌不是那么简单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芸芸众生挣扎图存于抗战炼狱中的四十年代，青年作家路翎凭借自己超凡的感受力、思想力和热情，试图搅扰古老民族貌似沉睡、实际上躁动不安的灰色灵魂，努力和他的人物们一起向时代精神的顶点攀登，一路上高举着自己挖出来的但珂式的心呼号前进。他没有从文学教科书学过什么固定的形式，也没有从社会学理论学过什么抽象的命题，更没有按照小市民的趣味虚构热闹而香艳的故事，而是沿着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文学传统，借鉴世界古典文学的创作经验，在广袤如“泥海”、错综如

^①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路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1994年10月香港初版。

“铁蒺藜”的现实生活中，通过体验、思维和创作的综合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地拓展着新文学主题未曾开辟的疆域，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的贫薄的库藏。

以本集所包括的作品为例，长篇《财主底儿女们》不但浓墨重彩地呈现了一个现代封建大家族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必然灭亡的命运，作者更通过对主人公蒋纯祖的叛逆性格的深层次描写，包括这个性格一方面同从四周扑来的封建主义势力的搏斗，另一方面同其“身内残留的个人主义成分及其身外伪装的个人主义压力”^①的搏斗，进行了“一场沉重的战争，意识形态的和文学形象的战争”^②，并为当时清醒而苦闷的青年知识分子唱了一阕痛苦而又欢乐的人生战歌。在中篇《饥饿的郭素娥》中，潜藏在劳动人民身上一直没有获得文学表现的辉煌人性第一次被充分地发挥出来，让一些衰弱而迟钝的心灵们久久为之震颤。短篇《卸煤台下》描写了矿工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相互扶持、共同反抗工头的庄严斗争，以及体现在这场斗争中的集体意识和团结感的觉醒过程；而鞭笞奴才性格、揭露“精神腐蚀”的短篇《罗大斗的一生》，则从另一个角度凸现了当代民主要求的复杂性和迫切性。至于另一些短篇，即使短得像《滩上》、《草鞋》、《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等，读者从一些细小而精悍的情节中，同样感受到主人公誓死反抗压迫势力和压迫环境的斗争意志，感受到作者一贯把人物、读者和他自己紧紧连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以及为这股力量所穿透的独特风格。这一切都有白纸黑字为证，都已经受过并将继续经受各种严峻的考验。

时间已经证明，路翎和他的作品是经得起考验的。提到路翎所经受过的考验，不能不同时提到他的批评家们。真正的批评家当然有义务帮助作家把作品写得更好，但没有权力指挥作家如何

① 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

② 路翎：《我与胡风》，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写作；他的主要任务在于独立地阐释作品，用理论的语言透视作品，使它通过他获得作家本人几乎未曾理解的更深刻的意义。批评家和作家实际上是按照不同的方式探索同一对象，归根到底是分别通过同一作品，从两种反映渠道启发读者认识生活，热爱生活，勇敢地改造生活。二者是“斯文同骨肉”的同志关系，路翎和他的患难与共的挚友、诗人兼批评家胡风先生之间曾经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然而，当年在封闭而浮薄的中国社会里，文学批评却一度朝着相反的方向发挥过专制的作用。迄今令人觉得理之所无而事乃竟有的是，青年作家路翎为在封建压迫下探索个性价值和主观战斗精神的庄严升华，而为中国新文学所作出的如此珍贵的贡献，在一些“用脑对待文学现象”（姑且再用一次这个不确切的定语）的批评家的眼中，不但丝毫没有激起他们作为“作家的知己”所应有的欣悦心情，反而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异端。说得客气一点，他们看惯了用情节演绎结论的创作公式，看惯了高高在上对待人物命运的冷冰冰的客观描摹，只会要求作家按照他们所理解、所设想、所规定的一切进行创作。于是在路翎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物群像面前不禁惶惶然，先是嗡嗡营营，喊喊喳喳，责备这位作者“歌颂自发性”、“迷恋人民的原始强力”、“欣赏精神奴役的创伤”，责备他“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情代替、歪曲纯朴而蠢笨的劳动人民心理”等等；继而一当那些机械的观点在深思的读者面前暴露了它们的庸俗和荒谬，便拿龇龇、蛮横、暴戾的文字垃圾向坚忍不拔的作者大加挞伐（详见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1955年），直至最后动用军警，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些一度独操文柄的批评家根本上由于无知，无知于生活，无知于历史，更不知文艺创作为何物，同时又由于从职业名义而产生的狭隘心理和自大狂，以及进而产生的宗派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了非文学的目的主宰着中国文坛。他们和作家的关系始终是他们自己认为决不可以改变的敌我关系，路翎就是这